

珍贵的书缘

——悼念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

钱存训

我为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写的英文本《纸和印刷》一册，于1985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于1990年首选此册译成中文，作为献给他九十岁生日的一份寿礼，令我感到荣幸。最近这一册又由台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重译，定名《造纸与印刷》，即将出版。我受该会之嘱写一内容提要，正在执笔回思，忽接英国转来的讣告：李约瑟博士已于1995年3月24日晚间在剑桥寓所故世，享年94岁。学术界失去一位大师，中国失去一位良友，个人失去一位知音，令人哀痛。他的学识渊博，才华过人，是一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和有争论的伟人。无论和他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都会感到钦佩，对他一生正直不阿的风度，也会表示景仰。我能和他合作乃是很大的荣幸，尤其我为他所写这一册的两种中文译本，前者为他祝寿，后者为他送终，可称巧合，也正好以此作为纪念我们之间一段难忘的友谊和珍贵的书缘。

两访剑桥 文字结缘

回忆我们相知，其后我们参加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

作，匆匆不觉已逾三十年。其间承他相邀于1968年写作开始前到剑桥访问；1972年他在加拿大作学术演讲，我曾赶去参加；1976年他来芝加哥接受名誉学位，我曾上台致词；1982年全稿完成后，我再访剑桥，并承聘请我为他创立的“东亚科学史研究所”

（现改名李约瑟研究所）永久研究员；1984年在北京召开也是他所倡议的“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我们曾一同出席，会后也曾先后访问台湾。1990年他欢度九秩荣庆，同时在剑桥召开第六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我已写好一篇论文准备前往参加祝寿，临时因事未果。近年来他两次断弦，又加行动不便，曾几次想去探视，也都未能成行。如今他与世长辞，从此将不能再亲聆教益，衷心感到愧疚和伤感。

我和李约瑟原不相识，最早相知要追溯到1964年，他在《亚洲研究学报》第二十四卷第四期撰文，评介我的英文本《书于竹帛》（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多加奖勉，认为是“卡特（Thomas F. Carter）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他说：“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作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钱氏和卡特一样，全书行文清晰利落，是要言不烦的写作典范。”这本书原是探讨印刷发明前中国书籍制度及铭文起源和发展的一部综合之作，指出中国古代文字纪录的多产、延续和广被性为世界文化中所独有的特色，填补了西方学术界所缺少的这一段空白。不意竟获得一位科技史权威的赏识。

因为我的书中有一章论及“纸和纸卷”，他于1967年十月间第一次来信邀请我参加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中有关造纸、制墨和印刷术一章的写作。那时他已经六十七岁，超过了退休年龄，而原计划中的全书七卷十四册（现已扩充至三十四册）大部分还没有撰写。他在信中说：

即使我活到八十四岁，也不一定能看到这部书的完成。

因此，我们决定要和一批合作者协力，能使我们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计划的实现……你对纸和印刷方面的专门知识，正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追求的对象，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我们的请求。

那时我正计划写作《书于竹帛》的续编，他的邀请可谓不谋而合。实际上，我对他的研究所知有限。经过一番思考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在1968年9月有欧洲之行。先到剑桥，他与鲁桂珍亲自到车站迎接，提着我的行李健步如飞。那时，他是剑桥大学贡维尔和凯斯学院的院长。

李氏为人诚恳坦率，平易近人，生活朴实，正直热心。他的身材高大，衣著随便，平日在家着一件中国蓝布长衫，足登一双布鞋，墙壁上贴着他自已用毛笔书写的对联；他对于中国的一切，都有五体投地之感，是一位道地的“中国迷”。他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很强，但会话不太流利，和他讨论时，他常准备好纸笔，把一些特殊名词用汉字写在纸上，以免口语不清。他搜集的各种资料，无论是摘录或笔录，都抄写在单页或卡片上，有时注明拼音或译文，再分门别类排列在文件柜中，有条不紊，便利检查。他的生活简单，工作效率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那时只有他和鲁桂珍以及一位书记和半职的图书管理员相助，所有写作、通信和杂务，大都自己动手，使我看到欧洲学者的朴实作风，令人钦佩。

道法自然 中西差异

在和他交谈中，他从未提起过他的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而只注重解释他的整个研究计划和要求我担任写作的部分。他说：这第五卷第一分册是《化学和化学工艺》，除造纸和印刷外，还包括纺织、陶瓷、火药等专题，拟定名为《战争与和平》，他认

为我的书中已有造纸和制墨的资料，再加一些有关印刷方面的叙述，写成一百页左右就可足够。他说我无需在剑桥工作，但希望在二、三年内完成，以便这一册能早日出版。我接受了这项任务，离开剑桥，顺道访问牛津、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图书馆和博物院，开始搜集资料以供参考。其后又遍访世界各地，资料愈集愈多，内容愈拓愈广，篇幅更是愈写而愈长。从草拟大纲到全书完稿，前后共花费了十五年时间，而篇幅却从原订的一百页扩充成为三十万言的一本专册，实非始料所及。

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先拟好各章大纲、子目和细节，交他过目同意，然后每章稿成，再请他审定批评。但是他从不批改，来信总是鼓励继续，也从不催促。其中造纸三章初稿于1972年完成，除历史和技术外，另有一章考证纸张在书写、印刷、文房、装饰、娱乐、衣著、甲冑、交易以及家庭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起源，这些虽与技术无关，但未有人做过系统研究。而这三章原稿共有二百多页，已超过原来估计的总字数，我请他决定是否删节或浓缩，以符合他预定的篇幅。他阅读后表示满意，决定全部保留。并说，他相信道家，道法自然，内容不加限制，因此，其他各章乃依照同样的篇幅和体例继续进行。可是印刷部分的原始记录很少而问题甚多，传播和影响部分则牵涉到全世界，范围广泛而资料庞杂。因此，我在芝大开设了一门“中国印刷史”教研班，藉此机会一面搜集资料，一面探讨问题，边教边写，同时也训练了一批青年学者从事这一专题的高深研究。

此册共写成十章：造纸、印刷（包括制墨和装订）及传播各三章。绪论一章，讨论纸和印刷为何在中国而不是西方世界所发明；最后一章并论二者的功能和影响作为结论。其中指出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虽然相似，但其影响则并不相同。在两个历史背景和环境不同的社会中，印刷术都使成本减轻、产量增加、流传广远，对促进文化发展、普及教育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

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在东西方不同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作用不同，结果却是背道而驰。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使民族语言及文学的发展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基础。这一结论和他人意见不同，但受到李氏赞赏，认为可提供他在全书结论中的一些思考。

谦虚礼让 语重心长

《纸和印刷》全稿于1982年中完成，秋季再访剑桥，商谈出版事宜。我在原稿的封面上按照已出版各册的前例，署名“李约瑟·钱存训合著”。但出版后这一册的封面上却是由我一人具名，而将他的大名改排在全书总名的上端，成为全套书中第一本改动版面而由个人署名出版的专册，这使我对他谦虚的风度更加钦佩。

他对许多和他合作者的尊重，也可从全书各册的前言中得到证明。无论是撰写专章专节的合作者，或是编制索引、打字、校对以至书写汉字的参加者，他都在书中特别提名，一一道谢。尤其对中国学者有时还要加上字、号，注明汉字，以免拼音误解。他的这种不愿掠美和尊重他人智慧的高尚品格，值得学习。这种谦虚的态度也和过去某些西方汉学家的作风大不相同。

他在这一册《纸和印刷》的序言中说：

这一分册使我们看到这一计划（指和他人合作）的第一个果实。我们说服了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我们亲密的朋友、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来完成我们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我们非常钦佩他为此所作出的贡

献……我认为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从钱书中，读者将可纵观中国造纸和印刷的整个历史，了解到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前，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他引证培根所说：“书中蕴藏着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使我们能避免过去的错误，从而不断地创新。”他接着又说：“让我们祈祷阻止任何邪风妖火降临于世，在一瞬间毁灭人类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文化，结束人类最辉煌的成就和赖以转载的印刷与造纸。”他的语重心长，值得深思。

这一册虽然李氏并未署名合著，但是因为收入他的大系中出版而受到重视和好评。正如《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中所说：“钱氏对此专题作了全面的叙述，无疑将受到读者欢迎；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册，此书已成为标准之作。实际上，第一版在发行之前就已销售一空。”据剑桥大学出版社报告，此册于1935年出版，1989年续印修订第三版，至今仍是全书已出各册中最畅销的一种。因为这一专题涉及中国四大发明中两种最重要的文明载体和工具，以此读者的范围比较广泛。李氏曾说这一册将另印单行本出版，但愿以此专册作为我们之间合作和友谊的永久纪念。

接受荣誉 重访花旗

在我们多年交往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也是他认为在他晚年的多次旅行中最高兴而具有象征性的一次访问，乃是在他阔别美国三十年之后，第一次重新踏上他曾经在此研究和教学多年的这块花旗土地，接受第一个美国大学颁给的名誉学位。那时他已有世界各国所授予的十多个荣誉学位，但美国却不在其中。当时，芝加哥大学有意邀请他来校作一次学术演讲并拟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以表扬他在国际学术界的特殊贡献。后来，在芝大决定授予李氏名誉学位后，学校当局要我先去信通知，邀请他在校中作一次学术演讲，并问他是否愿意来美国接受拟授予的名誉学位。他回信说：“我很愿意有一天可能前来。”经过芝大当局的疏通，终于为他办妥来美手续，使他能来到久别的美国。

1976年6月中芝加哥大学在春季的毕业典礼中授予李约瑟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在颁授证书的典礼中，我曾代表东亚语言文化系上台致词介绍：

李约瑟博士具有双重的杰出成就。第一，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的巨著《化学胚胎学》奠定了这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第二，他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创始人，他的三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二十世纪学术界一项不朽的贡献。他对中国“天人合一”理论的分析与发扬，开启了迄今未为人知的中国科学与技术，其中许多为西方所继承。他的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历史上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学者之一，而这一项研究在国际间正方兴未艾。

他的这一次访问，无疑是成功的，对他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他不仅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欢迎，也获得其他文化团体和企业界的重视。由于全国性传媒的访问和报导，他的在美活动轰动一时。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